

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，重温新中国的“立国之战”——

中国人民屹立世界东方的宣言书

■赵世沙 周一

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。在两年零9个月的战争岁月里，志愿军部队在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下，在志愿军总部的具体指挥下，英勇顽强、浴血奋战，将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赶回“三八线”以南，并最终迫使对方签订“没有取胜”的停战协定。毋庸置疑，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伟大的“立国之战”，它庄严地向世界宣告，中国人民必将坚定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，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阔步前进。

在此，我们选取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德川战斗、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坑道作战、志愿军空军勇斗强敌、抗美援朝战争收官之战金城战役这4个战例，展现志愿军官兵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、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和“一切为了前线、一切为了胜利”的后勤保障，共同回顾那段以“钢少气多”力克“钢多气少”的峥嵘岁月。

不惧艰险“包打德川”

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结束后，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未意识到志愿军已大举入朝，依然分兵冒进，妄图快速攻占整个朝鲜半岛，以尽快结束战争。鉴于此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经过研究，决心构筑东、西两个战场，并在西线的德川、宁远一带打开突破口，随后以较大兵力沿清川江一线穿插至美军侧后方，彻底切断敌军向南后撤的通道。如此一来，西线志愿军部队可从北、西北、东北、南等多个方向挤压对手的生存空间，且有江河天堑阻隔，势必给敌人造成巨大杀伤。

然而，南朝鲜部队此时已进至德川、宁远一线，并在两个城镇分别部署约1个师的兵力，若志愿军要从这里突破，就可能察觉我军意图，从而获得充足时间进行增援。如此一来，志愿军快速穿插敌军侧后方的战役目标难以完全实现。面对这一情况，第38军军长梁兴初主动请缨，提出由第38军独立“包打德川”，无需兄弟部队分兵支援，以此降低穿插任务受阻的风险。梁兴初是从红军时期历经战火考验的优秀将领，他作出这一决定，既是基于对全局战略的深刻把握，更是源于对全军将士战斗能力、高昂士气和顽强意志的坚定信心。

梁兴初的请求很快得到上级批准。第38军全体官兵闻讯后群情振奋，摩拳擦掌，誓要在这一仗中重创敌军，展现老红军部队的英勇作风。11月25日，担负迂回敌后任务的第112师在完成诱敌深入的任务后，立即转入反攻，需再次翻越海拔1200米的兄弟峰。由于出发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召开全师动员大会，各连队只能边行军边做思想工作。指导员们从队伍排头跑到排尾，挨个班级动员，高声喊着：“爬山是为了出敌不意，只要爬过去就是胜利！”

与此同时，第113师也按计划向敌军发起进攻。在突破前沿阵地后，部队却被江水阻隔。危急关头，师长、政委率先脱下棉裤和鞋袜，带头蹚入刺骨的冰水。当时正值朝鲜半岛北部严寒季节，江水冰冷彻骨，官兵们上岸后双脚踩在石头上，更是痛如锥心，但为了不贻误战机，第113师指挥员们强忍剧痛，迅速过江并发起冲锋。南朝鲜守军见志愿军官兵如天兵突降，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御。一时间，嘹亮的冲锋号声和震天的喊杀声响彻战场。最终，志愿军成功攻克德川、宁远两城，彻底撕开“联合国军”的侧翼防线，为下一步重创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齐心筑起“无敌坑道”

1951年10月20日，志愿军空军第3师停战谈判开始后，中共中央分析认



上图：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中，志愿军官兵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十字架山主峰。

资料照片

左图：志愿军在坑道内开展战地政治工作。

资料照片

为，谈判的中心问题，是确定军事分界线。尽管自1951年7月起，敌我双方的交战线基本稳定在“三八线”一带，但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始终未停止对我方既占阵地的蚕食行动，持续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。为此，志愿军总部专门指示一线各部：“所有重要之点，必须准备坚守，不得随便放弃。”这既是从保护实际的军事利益出发，又是对停战谈判的有效支持和配合。

然而，战役指导方针由运动歼敌转为坚守防御，对志愿军而言确实面临严峻挑战。此前数月，我军相继经历长津湖之战、汉江阻击战、铁原保卫战等战役，其中多次被迫转入阵地防御作战。实战表明，我军依托简易野战工事的传统防御模式，难以抵御敌军高强度火力打击，不仅出现较大伤亡，阵地也难以持久固守。因此，亟须创新出一种适合长期坚守、防护力较强，且具备一定防守反击功能的体系化工事，才可能完成这一战略转型下的防御任务。

1951年下半年起，志愿军部队在“三八线”附近与敌军对峙的同时，发动群众、积极创新，通过实战逐步摸索出一套科学的筑城方法。比如，第47军第140师通过挖掘大量猫耳洞式的防炮洞，有效保存了阵地前沿营以上规模的有生力量；第64军第191师在马良山战斗中，依托坑道式掩蔽部击退英军20余次进攻。这些成功经验得到志愿军总部的重视，在转发给其他部队的同时作出明确指示：“主要工事最好是隧道式的，厚度要达五米以上。”

1951年底，停战谈判双方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基本达成一致，战场进入开战以来难得的平静期。志愿军抓住这一时机，展开大规模群众性筑城活动：战士们将炮弹壳、弹药箱改造成数万件简易工具；基层连队组织技术小组拆解未爆航弹，获取炸药数万公斤。我军构筑的坑道防护力强、隐蔽性高，还能够给官兵提供系统化的战场生存空间，被大家称为“无敌坑道”。至1952年5月底，志愿军共构筑坑道7700余条，长度达198公里，另有掩蔽及露天式堑壕3400余公里，共同形成西起临津江口、东至东海岸杆城的一线坑道式防御体系。这一体系在后续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为“联合国军”难以突破的东方堡垒。

英勇打造“米格走廊”

1951年10月20日，志愿军空军第3师接替第4师，肩负起掩护朝鲜泰川新

建机场及平壤至安东交通运输线的重任。时任该师第9团1大队大队长的王海，在出征誓师大会上代表全体官兵庄严宣誓：“别看我们都是没有打过空战的新手，我们决不怕美国那些‘老油条’，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，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。”这支在朝鲜战场初次亮相的空中力量，尽管在装备水平和实战经验等方面与美国空军存在差距，但传承自老红军、老八路的血脉基因，铸就了志愿军飞行员们敢打必胜的钢铁意志。

初入朝鲜上空，王海率领的大队斗志昂扬，受限于装备水平和实战经验，战果并不显著。作为大队长，王海严格落实“打完必评”的要求，每次空战后都组织队员复盘分析，确保打一仗进一步。同时，他深入研究战斗机性能、机械原理和空战原则，并结合实战创新出适合我空军部队的战斗方法。经过反复推演，王海发现我军装备的米格-15在垂直机动性上优于美军战机，但水平机动灵活性稍逊。基于这一发现，他带领大队成员苦练俯冲攻击的战术技巧和协同要领，发挥优势、力避劣势，为后续空战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1951年11月18日，美军出动大规模机群突袭朝鲜北部永柔、清川江、安州一带，对我军后方重要铁路交通线实施狂轰滥炸。14时许，王海率领1大队紧急升空截击，在清川江上空与敌机群遭遇。令志愿军飞行员意外的是，美军此次采用环形罗圈阵战术：以8架战机为一组，首尾相连形成防御圈，这种编队能有效规避连续咬尾攻击，显著提升空战生存率。

这种阵型虽在二战时期就被多国空军采用，但对初上战场的志愿军飞行员而言仍是陌生战术。当时空战形势瞬息万变，若不能立即发动攻击，敌机完成轰炸后便会迅速撤离。危急时刻，王海果断下令指挥全大队俯冲突袭，借助米格-15优秀的垂直机动性能冲散敌军这一稳定阵型，随后采取双机编队战术，对失去队形保护的敌机实施精准打击。

志愿军战机的俯冲攻势果然奏效，美军机群的“罗圈阵”瞬间被打破。王海等人立即操作战机进行二次爬升，有效规避敌机可能发起的咬尾攻击，随后凭借高度上的优势迅速锁定目标，连续击落5架敌机，完成一场干净利落的空中歼灭战。

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，王海所在的1大队共参加空战80余次，击落击伤敌机29架，被誉为“英雄的王海大队”。而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志愿军空军先后有600余名飞行员和近6万名地勤

人员经受了实战锤炼。他们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空军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，更以过硬战绩打造了令敌人望而生畏的“米格走廊”，为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提供有力保证。

有力保障“万炮齐发”

1953年6月17日夜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破坏停战谈判达成的协议，引起国际舆论强烈谴责。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，毛泽东、彭德怀决定推迟停战签字，发起金城战役。

根据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，此役由志愿军司令部拟订作战计划，主要由第20兵团和第9兵团第24军遂行进攻作战任务，后勤保障由第2分部统筹负责，第1、4、5分部协同配合。尽管志愿军后勤体系较战争初期已有显著改善，但此次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仍面临不少挑战。一是兵力较多、战线较长，后勤保障压力较大。根据作战计划，东、中、西3个作战集团分别在金城川至松室里、松室里至金城东、金城至牙沈里的正面上进行突破和展开，其作战正面宽度分别为2.5公里、9公里和10.5公里，合计22公里。参战的营级单位超过200个，且对作战物资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、复杂化特点。二是战斗行动转换快，由此衍生的后勤保障方式也较复杂。按照计划，多数一线部队须在24小时内完成主要歼敌任务，并向敌军纵深突入5到8公里，这就需要多数部队进行火力准备、穿插迂回和攻坚破袭，所需物资也从普通的轻武器弹药，扩展到大口径炮弹、炸药、土工作业器材等，持续性保障难度较大。三是环境恶劣，对后勤运输产生不利影响。此时，正值金城附近地区的雨季，连日阴雨导致山间道路泥泞不堪，运输车辆难以通行。另外，该地区自停战谈判以来一直是敌我两军争夺的焦点区域之一，铁丝网、地雷、陷阱等障碍物密集，物资运输的效率受到很大影响。

为破解保障困局，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派出副司令员吴先恩会同第2分部统筹安排各项具体工作，共抽调10个汽车团连同参战炮兵运输车辆共2700余辆保证运输，赶运物资1.5万吨，准备各型号炮弹130万发、炸药23.4万公斤。截至7月11日，后勤部门为前线部队储备的粮秣基本可维持至7月底，确保作战期间无断粮风险。

7月13日21时，金城战役正式打响。志愿军“万炮齐发”，向金城以南的南朝鲜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。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，集中火炮数量最多、火力最强的一次战役，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后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反击战役。此役历时15天，志愿军第20兵团和第24军在以金城为中心，西起牙沈里、东至松室里的战线上进行突破，向南拓展阵地达160余平方公里，歼敌5.3万余人，改善了防御态势，打击了南朝鲜军和“联合国军”的嚣张气焰，有力配合了停战谈判。同样重要的是，在这场战役期间，志愿军后勤人员克服重重困难，完成了艰巨的保障任务，是我军后勤历史上成功保障大兵团作战的典型案列，志愿军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诫对手：打，我们有决心、更有能力奉陪到底。



链接历史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，陈列着一把志愿军战士赵顺山使用过的十字镐。75年前的云山战斗中，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348团9连4班副班长赵顺山，在轻机枪无法使用的情况下，用这把十字镐一连砍死3名美军。这把普通的十字镐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件“功勋武器”。

1950年10月，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疯狂北进，冲在最前面的是号称“王牌师”的美军骑兵第1师。作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整建制机械化部队，该师自参战以来未尝败绩。正因如此，美军骑兵第1师在开进过程中速度很快，其部分主力深入云山一带后与本单位拉开距离。志愿军总部敏锐捕捉到这一战机，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冒进之敌。

11月初，第39军发扬顽强战斗作风，以劣势装备重创美军骑兵第1师，使其四散溃逃。9连4班奉命在云山以南15公里外的公路两侧设伏，阻击南逃之敌。

接到命令后，4班长带两个战斗小组埋伏在公路左侧，依托田埂修筑简易工事。副班长赵顺山则率领机枪组占领公路右侧的排水沟，准备快速挖出一个散兵坑。没等他们修好工事，美军的汽车、装甲车等一辆接一辆沿着公路疾驶而来，4班迅即投入战斗。

4班在打掉溃敌前面的装甲车和汽车后，车队中的敌人开始疯狂反扑。战斗中，就在赵顺山换新弹夹时，一名美军便冲上来抢夺他手中的机枪。两人激烈厮打时，又有两名美军扑向赵顺山。

危急时刻，战友于世雄和田有福跃出工事，各自抱住一名敌人扭打起来。赵顺山猛力一拉，将扭打中的敌人摔进散兵坑，但对方仍死死抓住机枪不放，另一只手正要去掏手枪。赵顺山一手按住敌人掏枪的手，一手紧握机枪不放。相持中，美军凭借体型优势挣脱，快速掏枪。于世雄见状一掌打落美军手枪，赵顺山拾枪射击却发现扳机卡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抽出背上的十字镐，对准正要过来抢枪的美军抡过去，当场将其击毙。另一名美军见状转身逃跑，赵顺山几步追上手起镐落将其砍死。此时，与田有福搏斗的美军也要逃跑，被田有福死死拽住。赵顺山赶了过来，第三次举起十字镐，消灭了敌人。

消灭了3名美军，赵顺山和战友立

『功勋武器』十字镐

■赵学强 裴泽宁

即端起机枪继续射击。就在这时，嘹亮的军号响起，团里的增援部队赶到，歼灭了这一股南逃美军，4班胜利完成任务。

这场交锋打破美军“王牌师”所谓“不可战胜”的神话。赵顺山用十字镐杀敌的壮举，正是志愿军官兵不畏强敌、敢于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。云山战斗中，我军将士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，以“钢少气多”力克“钢多气少”，谱写了人民军队敢打必胜的英雄史诗。



赵顺山使用过的十字镐。资料照片

千帆逐江海

——中国古代战船（中篇）

■曹 波

春秋至战国时期，随着各诸侯国对抗日益激烈，战船在频繁战争中作用日益凸显，促使各国纷纷重视水军建设。偏处西陲的秦国为对抗楚国，亦扩建水军，设立造船场兴建战船，其水军出巴蜀、据楚都、下岭南，兵锋直指番禺，威震一时。这一趋势延续至秦汉时期，以多型战船为基础的水军，正式成为历代王朝不可或缺的重要军事力量。

随着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，战船建造呈现出铁木结合的新特点：以铁制构件建造战船，以铁制构件装配战船，以铁木构造的船具推进和操纵战船，以铁制兵器装备水军。这种技术革新始于战国，兴盛于秦汉，至隋唐五代达到鼎盛。大型水战逐渐成为常规作战形式，并常与陆战配合实施。本篇简要介绍战国至五代十国时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战船。

楼船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，其显著特点是上层具有多层建筑，船高首宽，外观似楼，故而得名。汉朝时期，楼船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。汉武帝为征服南越，曾建造众多大型楼船。据记载，汉朝楼船高10余丈，通常为3至4层，各层分别设有舱室、女墙、战略等设施，为士卒提供战斗依托和防护。作为主力战船，楼船成为汉朝水军的标志性装备，故汉朝水军又称楼船军或楼船士，东吴统帅则称楼船将军。三国时期，东晋建造的水5层楼船可载3000余人，船上列矛戈、树旗帜，巍峨如水中堡垒。随朝水军装备的大型楼船五牙舰，在隋灭陈战役中作为舰队指挥核心，凭借高大的船体和拍竿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唐朝时期，造船业进一步规范，并对楼船的形制构造进行改进，具体原则以作战需求为准，而非单纯追求船高楼多，可见该时期更注重实战性能。五代十国时期，南方诸国设有楼船指挥使一职，比如闽王王延钧从子王仁达就曾担任此职。

蒙冲，又作蒙艨，是中国古代一种

以速度著称的轻型战船。其船体狭长，覆以生牛皮作为防火之用，两舷各开数个桨孔以插桨槽，船舱四面皆设有弩窗、矛穴，兼具防护性、机动性与攻击性。该船型在汉朝已发展为水军主力装备，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中，东吴曾以蒙冲、斗舰为纵火船，点燃后冲向曹军水上营寨，一举烧毁曹军战船。

斗舰最早见于东汉水师编制，三国时期成为东吴水师主力装备。这种战船舰舷两侧设有垛形女墙作为防御工事，女墙下开有孔穴，便于士兵操桨行船。在船舷之上还建有一层名为“棚”的平台，平台上再设女墙，形成重楼结构，从而获得居高临下的攻击优势。其关键特征是“上无覆背”，即顶层是露天战斗平台，便于士兵使用弓箭射击和长兵器格斗。至南北朝时期，斗舰仍被用作城防水域的战略屏障。在唐平萧铣之战中，作为割据江南的梁政权统治者的萧铣，曾大规模使用斗舰作为水军主力装备。这一战例被记入《新唐书》，表明斗舰服役时间跨度超过500年。

走舸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型战船，最早见于《资治通鉴》对赤壁之战的记载。该船型结构较为简单，船上桨手多、兵卒少，故能灵活机动、往返如飞。走舸虽载兵卒不多，但皆为精锐勇猛之士，可乘敌不备突袭敌船、斩将夺旗。赤壁之战中，走舸曾作为战术辅助船只与蒙冲协同作战，点火之后更成为吴军紧急撤离的重要载具。

海鹞是唐朝水军制造的一种中型战船，其船体设计仿照海鸟形态，采用头低尾高、前大后小的流线型结构，并在舷下两侧安装形似鹞翅的浮板，船名由此而来。这种浮板设计能有效削减横向海风对船体的作用力，显著提升航行稳定性，使船只即便在风浪中也能保持平衡而不倾覆。在白江口之战中，唐军舰队以海鹞船等170余艘战船组成编队，通过夹击战术成功击败倭军千余艘战船。

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